

「誰」回來了？元首、惡魔、或者淡忘的歷史——帖木兒·魏穆斯《希特勒回來了！》以昔人之眼看現今社會

關鍵字：帖木兒·魏穆斯、《希特勒回來了！》、狂熱

一、 前言

《希特勒回來了》為德國作家帖木兒·魏穆斯所著的諷刺小說，假想一代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於二十一世紀復活後，在新世代所遭遇的嶄新體驗。全書以希特勒的第一人稱視角，詮釋當前的德國社會，並透過希特勒與書中人物鬧劇式的相處模式，一方面重新對納粹主義進行審視；另一方面諷刺社會現況。

以今人之眼回溯過往歷史容易；借昔人之眼觀察現今世態卻頗具挑戰。在《希特勒回來了！》中，作者帖木兒·魏穆斯不但未將希特勒勾勒為歷史惡魔，反而較強調其人的領袖資質與能力。筆者認為作者反大眾印象的描繪手法，並非為了博得「創新」的虛名，而是藉由著名——縱使是惡名——歷史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以對於當今社會的荒謬行徑進行批判與反諷。雖然希特勒過去諸多行徑令人髮指，但是作為元首，其領導與管理國家的能力卻又不容質疑。因此，借此人之名指出社會亂象更具說服力，進而引導讀者重新思索自詡安詳和樂的社會裡，被忽視的問題。

然而，無論希特勒的領袖才能何等卓越，始終無法搶救他的歷史名聲，況且作者的成書目的亦非為其辯護。因此，除了諷刺當代社會，作者也再度提點納粹與猶太的議題，提醒讀者「傷痛尚未平復」。

從希特勒的甦醒、再起、乃至於翻身成為媒體寵兒，希特勒以其群眾魅力，擄獲新世代的目光，企圖重建大德意志帝國。《希特勒回來了！》不僅呈現元首在成名之路上，對當代社會提出的犀利評論；同時藉由希特勒的迅速崛起，帶領讀者進一步思考：此位歷史狂人的興起，並非全然仰賴其個人特質，群眾擁護與時局趨勢亦為不可忽視的因素，尤以群體支持影響力為大。倘若希特勒過去的作為罪不可赦，何以昔人對其擁戴有加？當他穿越時空，抵達現代，何以今人對其崇尚不已？而面對歷史悲劇，後代子孫較佳的處理方式又為何？憶起元首、重觀納粹，並與歷史進行再一次的晤對，本文將依此脈絡，比較、分析納粹德國與現代德國看待「希特勒」的態度與觀點。

於本文稍後的篇幅中，主要針對四方面進行檢視：首先探討希特勒的狂熱精神和性格特質；再者省思納粹興起之因，以及其所造成的歷史傷疤；接著討論現今社會的問題所在；最後對照今昔之人對待希特勒的方式，省思後世面對歷史，所需抱持的心態。

二、 元首復活，狂熱未減

(一) 貫徹始終的狂熱信仰

希特勒深信「狂熱」能逆轉劣勢。個人、國家、全世界，無論身陷何等絕望的情境，倘若具備足夠的狂熱，則可突破危難，締造奇蹟。例如：諾曼第登陸時，對於德國以一擋百的行徑，希特勒認為關鍵在於「優越的自信」和「堅韌不屈的狂熱精神」。只要具備狂熱，則無事不成¹。

執行這份狂熱確實帶領德國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頹敗局面，然而，無限上綱的狂熱意志同時促成希特勒的一意孤行與自我中心。希特勒的狂熱除了拯救德意志民族同胞的「熱忱」，隱含更多唯我獨尊的「瘋狂」。由此狂人領導的德意志帝國，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自然成為攻城掠地的侵略國。

（二）自我中心的世界觀

身為前任帝國總理，縱使穿越時空來到二十一世紀，希特勒的獨裁手腕絲毫不減。只要遭遇不順心之事，希特勒第一個念頭即是「命令軍隊殲滅目標」。唯我獨尊的觀念結合支配權力的習性，重現了希特勒於納粹德國時期的獨裁。

此外，希特勒認為自身在二十一世紀的神奇復甦，實為天命使然。希特勒屢次重述自己身負天命——他是上天千挑萬選的人才，唯有「他」能引領德國迎向更強盛的未來。在小說中，他提問道：

「既然德國歷史上有這麼多偉人都在等待有第二次機會帶領他們的人民取得新的聲望，那麼，為什麼會是我？」²

接著，他思索出以下結論：

「因為這項等待被達成的艱鉅任務，顯然非常適合用來向那些最勇敢無畏之人，那些成就非凡、功績豐偉的德國偉人，證明他們自己的侷限。孑然無依，必須孤軍奮鬥，沒有黨機構，沒有政權，所以才託付給一個已證實有能力清除民主爛攤子的人。」³

希特勒的自信，來自於他積極的求知欲，加上豐富的人生歷練：戰場上的衝鋒陷陣，以及政治上的爾虞我詐。前者幫助他隨時掌握最新境況；後者養成他處變不驚的性格。兼具兩種特質，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新環境，希特勒竭盡所能去理解目前的處境，最後將自己定位為「天選之人」的角色，拯救祖國同胞脫離險境。

如同希特勒在莊孝維的電視節目中首度登場時，他非但沒有演藝界新人的緊張不安，反而表現出冷靜沉著：

¹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113。

²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57。

³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57。

「世界上始終存在著多數人無法理解，甚至沒有能力評斷的事物，眼前這件事，就必須信任元首有足夠智慧能妥善處理。」⁴

面對新環境而處變不驚的人格特質，賦予希特勒為所欲為的膽量。從啤酒館政變到重建納粹黨，乃至於成為德國總理，希特勒總是嘗試突破——突破既有的規章、搗毀現行的制度，從而建立符合自身理念的國度。支持這份大膽妄為的力量，源自於希特勒堅不可摧的自信以及狂熱信念。

然而，無限上綱的自信心無可避免地發展成自我中心，甚至促成希特勒專斷獨行的性格。在小說內文中，德國在生活型態、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等方面，往往遭受希特勒的批評。例如：看見柏林的市容時，希特勒先評論「絕大多數建設得不合標準、簡直可怕的大雜燴」；接著批評「商店樣貌的一成不變」；最後得出「房舍外型普遍平庸單調」⁵的結論。

另一方面，希特勒對於國家建設則自有一套規劃：

「我繪製了高速公路和鐵路系統，這次在烏拉山另一邊也設立了幾座火車站，以及一座通往英國的橋樑。他們（按：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挖了條隧道，不過我終歸比較偏好地面上的解決方案。」⁶

之所以難以滿意現代德國的情況，在於二十一世紀的德國，已非希特勒當年親手打造的大德意志帝國，因此無法實踐他「個人化」的理想國度。而面對無從理解和掌控的新世界，希特勒自然心存質疑。

自信、自我中心、專斷獨行，隨著希特勒逐步認定自己正是萬中挑一的天選者，而自以為是的使命感加上野心勃勃，總和出一代元首的獨裁專制。

三、種族對立，從未止息

（一）過度膨脹的民族精神

種族淨化向來是希特勒的執政重心之一，對他而言，唯有雅利安人最優秀；只有德國人民最高尚，因而無法接受民族融合的新社會。他不但暗自慶幸街上沒有混血兒，甚至發誓要「從劣等人的工作中拯救出德國人民」。希特勒在街上閒逛時，曾提到：

「我在統治時期推動的措施雖然沒有持續進行，但顯然有了回報，幾乎看

⁴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145。

⁵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91。

⁶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255。

不到什麼混血兒。」⁷

在他的個人網站中，希特勒也毫不避諱地評論猶太人如下：

「因此可以確定在犬類裡面找猶太狗。那麼接下來的做法便顯而易見了：我們要找的是一隻阿諛奉承、討好巴結、垂涎貪婪，且埋伏暗處，隨時從背後偷襲別人——顯然就是德國臘腸狗。」⁸

綜觀上述言論可知，希特勒始終追求的是極度純淨的德意志血統，不容許其他劣等民族的基因玷汙雅利安的血脈。如此過度膨脹的民族精神，已扭曲為種族歧視，進而產生了極端的「排外」情結，乃至於訴諸屠殺行動以消滅非雅利安的種族。高舉民族意識至上的旗幟，德國人民被希特勒激發的並非國家凝聚力，而是剷除異己的殘暴行徑。

（二）難以觸碰的種族議題

小說中的希特勒經常被旁人提醒「審慎對待猶太議題」；而其助手克羅邁爾小姐也因為猶太血統而打算辭職。可見時至今日，「希特勒」之名始終是猶太民族難以癒合的傷疤；「猶太議題」仍然是德國尚未妥善處理的歷史悲劇。然而，面對猶太議題，小說中的德國社會呈現的是集體逃避的心態。多位小說人物曾提及「猶太主題不可任意開玩笑」的言論，卻從未進一步說明原由。可見該議題是德國全體不言而喻的事實，卻無人願意重新審視，反而以「禁忌」之名義將其深埋於歷史的角落。除此之外，作者對於猶太遺族的心情寫照著墨不多，反而花了較多的篇幅讓希特勒暢言其種族主義，直至揭露克羅邁爾小姐身世的段落，才沉重地引爆對於希特勒的不滿與反抗：

「……我乾脆告訴她是為您工作。沒想到她火冒三丈欸，大大發了一頓脾氣，還忽然哭了起來啦。她說您做的事一點也不好笑，沒有一件事值得發笑。像您這種人根本就不應該存在。……」⁹

當社會試圖逃避歷史責任時，當事人卻永遠不會忘記希特勒奪走多少族人的性命；而納粹摧毀無數同胞的人生。即使後代盼望將悲劇放逐於時間的洪流中，傷痛早已銘刻在受害遺族的血脈裡而難以抹滅。

四、 嶄新世代，新舊問題

（一）新的社會問題

⁷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121。

⁸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228。

⁹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289。

1. 乏善可陳的媒體

希特勒視媒體為宣揚政治理念的利器，卻同時批判媒體內容的乏善可陳。媒體握有較多資訊來源，原本應為人們迅速掌握外界局勢的管道，卻淪為商業廣告與娛樂新聞的公布欄。《希特勒回來了！》一書，也利用一個章節的篇幅，呈現今日電視節目的內容：性質大同小異的節目、缺乏啟發性的喜劇片以及新聞報導旁眼花撩亂的跑馬燈。在觀看完電視節目之後，希特勒評價此類節目不但「缺乏精神內涵」而且「惹人厭煩」¹⁰。

除此之外，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媒體處於優勢一方，卻利用此優勢製造錯誤消息誤導視聽，如小說中的《畫報》屢度捏造關於希特勒的報導。例如希特勒與書報亭小販敘舊的過程，卻被《畫報》敘述成：

「Youtube 狂人希特勒：

與酒鬼廝混。」¹¹

至於與助手克羅邁爾小姐的互動，則被扭曲為：

「Youtube 狂人希特勒：

他身邊那位神秘女子是誰？」¹²

面對不實報導，克羅邁爾小姐則忿忿不平地批判此為「《畫報》平時卑鄙的伎倆」，藉由將人冠上齷齪的標題，以引發眾人群起撻伐¹³。可見媒體不僅掌握了閱聽人的資訊來源，並能透過剪裁、竄改內容，以左右觀眾的想法。此社會問題不僅導因於媒體素質的普遍下降，也源自於觀眾對於內容的偏好：聳動誇張的八卦消息、輕鬆愜意的旅遊介紹，往往比起正經嚴肅國際局勢更能吸引注意力。為了迎合觀眾，媒體捨棄實際但略顯單調的報導，轉而選擇誇大不實卻引人注目的主題。

因此，除了媒體急需改正之外，閱聽人也應自我檢討。一方面多加關注國際情勢，另一方面小心檢視取得的資訊，則不但可改善媒體的素質，自身也不會輕易被錯誤訊息所誤導。

2. 多餘的文化節慶

作者藉由希特勒的視角，描繪德國節慶「啤酒節」的情景。冠上文化節慶的美名，啤酒節其實無法提供一般市民休閒娛樂的去處，白晝時分是酒鬼合法的聚集地；夜晚時段則成為跨國企業的社交場所。希特勒對於啤酒節的舉辦提出以下評斷：

¹⁰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80。

¹¹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212。

¹²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217。

¹³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221。

「顯而易見的是，精神健全的人不會在幾個月或幾年前就是先預訂好民族節日。因此我得知上午或下午前往那裏的，多半是遊手好閒的德國人，或者受到著名節慶氣氛吸引而來的外國人和遊客，他們硬是要把中午時間喝得像是夜晚時光。」¹⁴

針對啤酒節引發的亂象，小說作出詳盡的描述，包括：喝醉者或是倒臥於公共場合、或是任意便溺、或是當眾舌吻纏綿等，這些有礙觀瞻的行為不但未能宣揚傳統文化，反而破壞了德國社會的形象。

讀者於此也不妨思考，眾多政府大力宣傳的文化節慶是否必要？又或者僅是政府企圖討好民心的噱頭？

（二）自古皆然的集體意識

希特勒的瘋狂言論，倘若沒有旁人的響應，縱使其人能言善道、魅力十足，他的政治理念依然無從推廣。無論過去，或者現代，希特勒都需要一批追隨者；而如其所願，無論今昔，皆出現了追隨元首的人們——嚮往、崇拜，甚至信仰希特勒。人們總是需要可以信仰的對象，以作為精神寄託。當信仰人數逐漸增加，透過成員間的鼓勵與認同，進一步加強了該信仰的影響力，此為「集體意識」的形成。在 Gustave Le Bon 所著的《THE CROWD：烏合之眾》裡，提出「群體具有類似於催眠作用」的觀點。Gustave Le Bon 認為，群體本身並非眾多個體的集合，反而會形成一個「單獨的存在體」，並且受到群體精神的統一。¹⁵對於群體特徵的觀察，Gustave Le Bon 則給予以下評論：

「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凸顯；藉由情感與觀念的暗示作用與相互傳染，使所有個體朝向一個方向轉變並立即將暗示行為化為行動。」¹⁶

當個體處於群體中，其獨特性將被削減，使得群體成員的思想被迫趨於一致。其中因素涉及心理學層面：當個體進入群體後，彷彿得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因為個體無須承擔自身的責任，對於任何行為的風險，將由群體共同承擔。這股無畏的力量造就群體的盲從性質，群體成員如同被催眠者，易於受到外來暗示——可能是該群體的領導人，或者純粹的情感刺激——所操弄。Gustave Le Bon 在《THE CROWD：烏合之眾》一書中揭露如此現象：

「群體永遠徘徊在無意識的邊緣，隨時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揮。它們表現出所有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是缺乏理性的。」¹⁷

¹⁴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320。

¹⁵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年)，頁 51。

¹⁶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年)，頁 58。

¹⁷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年)，頁 65。

也因為群體的行動的動機往往奠基於情感因素，為「群情激憤」引發的效果，造成群體的部分行為不但欠缺審慎思量，甚至在群體外的個體眼中是荒謬無比的。如同希特勒的種族淨化政策，該行徑顯然泯滅天良，卻無人阻止，彷彿屠殺政策得到德國全民的許可。造成此情況的可能原因，一方面在於納粹的極權統治，導致市井小民不敢出言反抗；另一方面，恐怕是德國百姓（尤其是亞利安族裔的德國人）在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下，認可了消滅外族的行動。回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受制於《凡爾賽條約》苛刻的懲罰中，高失業率、通貨膨脹等經濟危機接踵而至，此時的德國人民渴望一個「強人」的誕生，帶領他們脫離晦暗慘淡的時期。恰巧，希特勒的理念因應了德國人民的期望，當群體的認同與期待一致流向希特勒，在實際面向，他坐上德國總理的大權之位；在精神面向，他成為全體人民的信仰中心，進而取得人民思想的控制權——給予「群體」人民暗示，使得人民臣服於狂熱信仰、屈從於民族意識，終至默許慘無人道的屠殺行動。

對於群體盲從而欠缺思考的性質，Gustave Le Bon 得出了以下無奈的結論：

「群體只有強大的毀滅力量。」¹⁸

在納粹德國時期，民族意識雖然一度振興了殘破不堪的國家，同時，卻成為歷史悲劇的導火線，隨著集體意識的火上添油，加上領導者的煽風助勢，終究延燒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

然而，時至二十一世紀，縱使被定位成「歷史惡魔」，希特勒依舊再度奪得眾人的焦點。在小說中，作者以希特勒的視角，對於其經紀人薩瓦茲基做出以下描繪：

「他眼神發亮注視著我，眼裡在在流露出確鑿無疑的崇拜與尊敬。我很熟悉這種目光，……薩瓦茲基注視著我，不動聲色默默傳遞崇敬之意，就如同我當年在紐倫堡賦予數十萬民眾希望後，從他們身上看到的一樣。」¹⁹

對閃光燈製作公司的員工而言，希特勒表現出精湛的演技，因而獲得同事的讚賞與敬佩；對德國的社會大眾而言，希特勒既是演員，更是「突破」現況的力道——一語道破社會問題、大膽挑戰猶太議題——這份突破為一成不變的社會帶來了「新奇」之感，先是引起部分人士的好奇心，透過網際網路的流傳與媒體的渲染，關注希特勒的人數也逐漸攀升，終至於成為共通話題。即使現今德國早已遠離艱困的時代，社會的從眾心態卻絲毫未減。網路帶來資訊的迅速交流，同時排擠資訊量不足的個體。換言之，現代社會透過話題創造共通性，並藉此建立談論者的凝聚力，從而排擠無法參與該話題的個體。

¹⁸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年），頁47。

¹⁹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163。

由丹尼斯·甘塞爾所導演的電影《惡魔教室》，部分劇情與此現象相互呼應。例如：主角賴納·文格爾老師曾於獨裁政治的課堂上和學生討論到「人們用集體意識區分團體」²⁰。在過去的納粹德國，該集體意識為「民族意識」；但在二十一世的德國中，此集體意識則為社會的從眾心態。無論是何者，皆為獨立個體面對群體的無力與弱勢。一旦違反群體的共同精神，則會淪為被排除的目標。如同電影《惡魔教室》中，主角賴納·文格爾首先提及「團結製造力量」，接著又說道「我們將所有反對我們的人排除我們的集體」²¹。一個群體愈加團結，則其排外的傾向也愈加強烈。當個體面臨群體人多勢眾的壓力時，往往選擇與之同化，以換取生存空間。綜合上述觀點，可知集體意識的形成是古今世代必然的趨勢，眾人必須符合主流價值觀，方能在社會上立足。而主流價值觀的導向，將會決定社會整體行為的善惡。

希特勒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配合網路、媒體的廣泛宣傳，再加上德國社會的從眾心理，不斷強化他的影響力與感染力。如同小說最後所言：

「過去也不全然那麼糟糕。這樣便可動手進行了。」²²

這句話似乎暗示著：於二十一世紀的德國，希特勒非但未因歷史罪名遭到唾棄，甚至開始洗清他的惡名。他能否再度崛起？納粹主義是否復興？又歷史悲劇會不會再現？上述疑問的答案，並非單由希特勒決定，更是取決於德國全體人民的選擇。無論今昔，型塑希特勒為「希特勒」的，實為德國人的集體意識。

五、 時間流逝，心態已變

（一）被淡忘的歷史傷痛？

全書之中，希特勒眾多聳動發言未被制止。就法律層面而言，其言論在「藝術」的保護傘下而免於訴訟之憂；就網路層面而言，希特勒被塑造為引領新思潮的領袖；就社會層面而言，無論是市井小民（尤其是年輕人）、媒體記者還是政治人物，爭先恐後想要接近這位當紅之星。這些人支持希特勒的原因不在於受其政治理念感召，而是因為希特勒帶來了「突破」——毫不隱諱的指出社會問題，甚至將最敏感而難解的猶太議題搬上檯面高談闊論。

然而，當現今社會如眾星拱月般吹捧希特勒，卻忘了存活至今的受害者的遺族的感受。對他們而言，「希特勒」這個名字是人生中絕不能忘記的傷疤、絕不能寬恕的仇恨與絕不能妥協的抗爭。後人將歷史悲劇視為「歷史」；對當事者而言，卻是切身的「悲劇」。作者於小說中穿插克羅邁爾小姐請求離職的橋段，是全書中對於納粹行徑最赤裸、最悲痛的控訴：

²⁰ 丹尼斯·甘塞爾導演、編劇，《惡魔教室》（德國，2008年）。

²¹ 丹尼斯·甘塞爾導演、編劇，《惡魔教室》（德國，2008年）。

²²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364。

……克羅邁爾小姐口氣冷淡。「……不，錯誤之處在於那個想到要殺死猶太人的人！還有吉普賽人、同性戀！以及所有不符合他心意的人！讓我告訴您：荒唐的是，若非要殺掉所有人，也不會有人被錯殺。就是這麼簡單！」

23

在讀者閱讀《希特勒回來了！》的過程中，無論是依循希特勒的視角觀看現代社會的種種荒謬；或者純粹以旁觀者的角度恥笑希特勒與其他小說人物的滑稽互動，鮮少讀者意識到歷史議題的沉重。本書甚至被歸類為「喜劇」。然而，書中卻反覆出現「猶太議題不可隨意開玩笑」的觀點：首先為書報亭小販對希特勒的提醒；再者是上司貝里妮女士的警告；最後甚至由希特勒親口說出，藉此駁倒綠黨代表人昆納斯女士的言論。重覆三次的想法，恰好安排在希特勒的成名前後，不僅是書中人物對希特勒的提醒，同時也是作者對於書外讀者的呼籲：悲痛不會隨時間淡化，而會在某些人心中，烙下永遠醜陋的疤。而身處後代的讀者，即使歲月已遠，仍應具備歷史的責任感，去面對、理解並承擔傷痛。

（二）歷史需要「被記得」

對於當事者而言，時間模糊了事件細節的描述，卻無法淡化悲痛的情緒。然而，隨著當事者一一殞落，後代對於歷史議題的感觸也逐漸淡化，形成對歷史的漠視與麻木不仁。如同小說中呈現的多數人物，相信希特勒與納粹德國已走入歷史，因此面對「希特勒」的再現，他們始終認為眼前的希特勒是一名精通方法演技的演員所裝扮，而非史籍上聲名狼藉的元首希特勒。此現象表達了後代子孫對於歷史的兩種無感：笑看歷史悲劇的禍首，是對於悲劇犧牲者的漠然；未察覺自身背負的歷史責任，是對於事件本身的冷淡。其中，克羅邁爾小姐即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當然是舉手禮了！右手要舉高。」

她的臉龐綻放出理解的光采，猛然跳了起來說：「我就知道，果然沒錯！就說是那個方法演技吧！我必須馬上做嗎？」²⁴

克羅邁爾小姐具有猶太血統，在其祖母揭露抄家的悲劇之前，她毫不遲疑地接受希特勒的行禮要求，並且欣然稱呼希特勒為元首。雖然在小說中無法判斷克羅邁爾小姐是否早已得知自己為猶太後裔，其人對待希特勒的方式，卻能展現後代面對歷史的冷漠。縱使作者並未針對「漠視歷史」加以闡述，卻透過小說人物嬉鬧、玩笑、不正經，表現出後代對於歷史的冷漠。

儘管如此，也不可能強迫後代子孫懷抱與當事人同等的傷痛。因為未曾經歷過的悲劇，自然沒有刻骨銘心的哀痛。因此，比起爭論是非對錯、追究罪魁禍首，

²³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292-93。

²⁴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年)，頁 124。

或逼迫禍首的子孫俯首認罪，歷史更需要「被記得」——歷史不是特定世代的故事，而是全人類共同的記憶，是人們必須面對、承擔，並且謹記教訓，繼而開闢與經營嶄新的世代。

六、 結論

《希特勒回來了！》以希特勒之眼去理解讀者所處的社會，除了假借一代元首犀利的眼睛去批判當今社會問題，同時喚醒讀者對於歷史責任的覺察，並且認知到集體意識的盲從，所伴隨的危機。筆者認為閱讀完此書後，應當抱持「謹記歷史，開創新局」的心態，一面記取歷史教訓，一面正視當今問題並妥善解決。

參考書目

1.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
2.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 年。
3. 丹尼斯·甘塞爾導演、編劇，《惡魔教室》，德國，2008 年。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